

以纸为媒寻找古代社会文化脉络

何 灿

看点 《叹为观止：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》不是一部单纯的工艺史著作，而是一场以古纸为媒介的文化探秘。本书看点在于：将纸张从被动的书写载体，还原为积极的文明塑造者。作者赵洪雅透过纸的纤维，为我们打开观察中国社会的新窗口——纸张的等级体系微妙映射着社会阶层结构，纸张成为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；从写本到刻本的转变，纸张的改进深刻影响着知识传播形态。我们不仅能感受古纸之美，更能在纸张的纤维间，倾听文明的回声。



《叹为观止：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》(以下简称《叹为观止》)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科技史或工艺史著作，而是一部以古纸为媒介，探寻中国古代社会文化隐秘脉络

的匠心之作。作者赵洪雅以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对古纸的痴迷，带领读者穿越千年时光，在纸的纤维间读取文明的密码，在纸的流传中窥见社会变迁的轨迹。

《叹为观止》的内容架构颇具匠心，全书以“传说”与“历史”两条线索交织展开。上篇“古纸传说”探讨纸进入人类精神世界的过程，下篇“古纸历史”则梳理古纸的工艺演变与实用功能。这种结构安排既照顾到时间维度上的历史演进，又兼顾了古纸所承载的文化意涵，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叙事空间。作者巧妙地将纸张的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相结合，使读者能够在欣赏古纸之美的同时，理解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多重角色。

在文本风格上，书中既有严谨的考证，又有优美的文学表达。如对灞桥纸是否为真正纸张的辨析，对左伯纸与张永纸制作工艺的还原；对澄心堂纸“滑如春冰密如茧”的描述，对薛涛笺“深红小彩”的想象。这种学术性与文学性的完美融合，使《叹为观止》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写作范式。

古纸研究看似冷僻，却蕴含着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关键。赵洪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，通过对古纸的细致解读，打开了一扇观察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独特窗口。在《叹为观止》中，纸张不再是被动的书写载体，而是积极的文化塑造者和社会变迁的参与者。纸的等级体系微妙地反映着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结构。书中详细辨析了从朝廷御用的澄心堂纸、金粟山藏经纸，到文人雅士钟爱的宣纸、玉版笺，再到民间通用的毛头纸、桑皮纸，每一种纸张都有其特定的社会位置和使用群体。这种纸张的等级化不仅是工艺水平的差异，更是社会阶层区隔的物质表征。当乾隆皇帝用特制的“乾隆大库蜡笺”书写御制诗文时，他不仅是在创作文学作品，更是通过纸张这一媒介彰显皇权。而当文人墨客相互馈赠赠纸，或在纸上题跋考辨时，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文化资本的交换与积累。

尤为精彩的是，赵洪雅揭示了纸张如何成为文人阶层建构自身认同的重要工具。书中对薛涛笺的考辨别开生面，作者不仅考证了这种小幅彩笺的制作工艺，更深入分析了薛涛笺如何成为唐代女诗人文化身份的象征。当薛涛创制出这种小巧精美的诗笺，她不仅是在满足实用需求，更是在为自己寻找一种适合的表达形式，一种能够承载女性细腻情感的物质载体。与此类似，书中对宋代士人追求“纸白如雪”的审美倾向的分析也颇具洞见，这种审美不仅反映了宋代文人的清雅趣味，更隐含着他们对纯粹知识、清明理性的精神追求。

古纸的地方谱系则勾勒出中国古代知识传播的地理版图。赵洪雅详细梳理了徽纸、蜀纸、赣纸、闽纸等不同地域生产的纸张特点与流变，揭示了纸张生产与知识中心形成的内在关联。当徽州成为明清时期的造纸重镇，它不仅生产出高质量的宣纸，更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流迁于此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。纸张的流动与知识的传播相伴而行，共同构建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地理格局。

纸张并非被动地承载知识，其物质属性深刻地影响着知识的形态、传播方式甚至内容本身。《叹为观止》揭示了古纸在知识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能动作用。书中对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纸张差异的分析极具启发性。作者认为，从写本到刻本转变，不仅是复制技术的革新，更与纸张的改进密不可分。唐代以后，纸张质量的提高使书籍能够容纳更多文字，经折装、旋风装等新装帧形式的出现，都与纸张性能的改善有关。这种物质基础的变革，最终推动了知识形态的转变——从零散的卷子到完整的册页，从口耳相传的师承到可供反复研读的典籍，纸张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

古纸既是实用物品又是文化符号。“纸寿千年”指有的纸张能够保存千年而不损，但不同纸张的寿命差异巨大，有的纸张在几十年间就脆化变质。这种差异

不仅关乎制作工艺，更反映了不同时代、不同阶层对知识保存的态度。书中对古纸修复与鉴定的讨论尤为精彩，揭示了当代人如何通过古纸与历史对话。作者以自己参与的古籍修复项目为例，生动描述了修复师如何通过分析纸张纤维、帘纹、白度等特征，判断古籍的年代与真伪，进而决定修复方案。在这种细致入微的工作中，古纸不再是冷冰冰的文物，而是成为连接古今的媒介。当修复师用与原著相似的纸张填补残缺时，他们不仅是在修复一件物品，更是在续写一段历史。

赵洪雅通过对古纸的解读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新视角。传统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多侧重于文献记载、图像资料或实物遗存，而忽视了作为这些资料载体的纸张本身。媒介不仅是信息的被动载体，更是文化的积极塑造者。纸的质地影响着书写的方式，书写的方式又影响着思维的习惯；纸的流通范围决定着知识的传播边界，知识的传播边界又塑造着文化的格局。这种从媒介角度切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径，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可能。

在纸的纤维间穿行，感受文明的脉动。轻抚书页，似乎能触摸到蔡伦改进造纸术时的专注，感受到王羲之在蚕室纸上挥毫时的洒脱，体会到苏轼在澄心堂纸上题跋时的沉思。这些历史人物与事件，在赵洪雅的笔下复活，成为与读者对话的鲜活存在。

纸是人类文明的产物，却又反过来塑造着人类文明的形态。《叹为观止》的独特价值，在于它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古纸的历史，更让我们重新思考纸与文明的关系。在纸的诞生、发展、鼎盛到逐渐被电子媒介取代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自身的轨迹。纸的“传说与历史”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隐喻——我们创造工具，工具又反过来塑造我们；我们改变媒介，媒介也在改变我们。我们珍视这种对话，在纸的纤维间，倾听文明的回声。

钱钟书“心史”的幽微探照

刘江涛

范旭仑所著的《容安馆品藻录》如同一把精心打磨的钥匙，试图开启钱钟书那座既向世人展示又深锁内心的“容安馆”密室。这部800余页的巨著，以钱钟书的私密札记为底料，经范旭仑之手精心烹制。《容安馆品藻录》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体系严谨的专著，而是一部精心编纂的“笺注之书”。其书名“品藻”二字，取自《容安馆札记》中钱钟书“月旦人伦，平章学术”的平生志业。范旭仑的工作，是为钱钟书散布在手稿巨著中的、针对近世人物的大量“品藻”之语，“代下注脚，发皇心曲”。

《容安馆品藻录》堪称一部以学人为中心的现代学术心灵史。全书按品评对象的身份与关系，划分为“师友时流”“老辈”“末学”“家人”四大类别，涉及人物达190余人。其中，“师友时流”占据全书近2/3的篇幅，无疑是重中之重。这一分类本身就暗合了钱钟

书交游与评判的经纬网络：从父执辈的陈衍、恩师吴宓，到同辈学人如胡适、周作人、鲁迅，再到学生辈的后起之秀，乃至鲜为人知的家事。这种架构将原本零散、隐秘的札记碎片，还原到了一个具体的人际关系和时代语境之中。这种“以人系言”的编纂法，使得本书不仅是一部钱钟书评论资料的汇编，更是一部以钱钟书为焦点的近代学术思想史侧影。

范旭仑在学界素有“钱学研究专家”之誉，其对研究钱钟书著作三十年如一日的功力与精熟程度在《容安馆品藻录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钱钟书的《容安馆札记》《中文笔记》等手稿，字迹密布，涂改勾乙，辨识难度极高。范旭仑不仅辨识了文字，更能洞察文字背后的思想轨迹，若非对钱著及相关文献烂熟于心，绝无可能做到。

作为一部学术著作，《容安馆品藻

录》的文本风格极为独特。它既有传统考据学的扎实与绵密，又透着一股不容分说的烟火气，为普通读者理解钱钟书的晚年心境与真实好恶，提供了丰富材料。

范旭仑的文字是典型的“笺注体”。他的叙述往往以钱钟书的原文为纲，随后旁征博引，从钱氏已刊著述、书信、口述史料，乃至同时代人的日记、回忆录中寻找印证。这种写法要求作者“竭泽而渔”地占有材料，其引用的文献甚至细致到本书结稿前的最新出版物，可见其“精勤”。这种文本风格，源于范旭仑对研究对象的高度共情。

正是这种强烈的个人风格，赋予了这本著作一种罕见的阅读快感，使其读来毫无沉闷之感，反而如同一部侦探小说般引人入胜。范旭仑数十年来专注钱氏一家之学，其著作《钱钟书著作考异》更是“四十五年辛劳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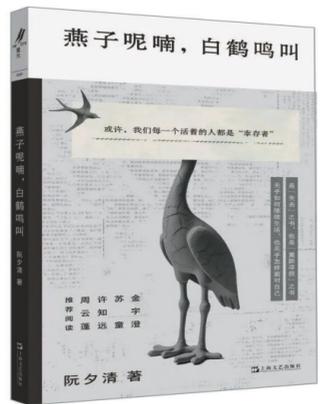
得”。这种深厚的积累，使《容安馆品藻录》在材料的翔实与考订的精准上，达到了一个高度。书中有大量对钱氏手稿字句的重新勘定，以及对钱氏所读书版本的考订，这些都是范旭仑独家功夫的体现。

那些熟悉的掌故、人名、书名，在范旭仑的串联下，瞬间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全书涉及人物近两百人，其中不乏钱仲联、冒广生、郭绍虞等专业领域的大家。范旭仑的行文高度凝练，多用典故与文言句式，且经常在正文与按语之间跳跃，需要读者具备相当的文史功底才能跟上其思路。

《容安馆品藻录》以其宏大的架构、精深的考据和鲜明的个性，完成了对钱钟书隐秘精神世界的一次大规模勘探。范旭仑在钱钟书手稿的密林中开辟出一条通衢，让后来者得以窥见那些被时间尘封的“心史”。

让地方日常叙事透出科幻微光

汪 翥



阮夕清的《燕子呢喃，白鹤鸣叫》是一部难以被轻易归类的作品集。它既是对地方性经验的深情书写——那些氤氲着苏州水汽的人物与场景，又是对未来可能性的冷峻窥探——在看似传统的叙事理中，悄然嵌入科幻质感的元素。这种独特的混溶性，使阮夕清的短篇小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时间质感：它们不是线性地讲述过去、现在或未来，而是让不同的时间

维度在同一文本空间中叠印、碰撞，最终生成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学真实。

《燕子呢喃，白鹤鸣叫》收录的短篇小说，大多以苏州为背景。但阮夕清笔下的苏州，不是园林、小桥、流水的旅游符号，而是活生生的、正在呼吸的城市肌体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他对苏州方言人群的书写。在这些故事中，讲苏州话的人不是作为地方色彩的装饰，而是作为真实的、有血肉的人物存在。他们操着软糯的吴语，在街巷间穿行，他们的思维方式、情感表达、甚至对世界的理解，都与这种语言紧密相连，是在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感知和建构世界。

在《运河铁人》中，这种对地方经验的书写达到了某种高度。故事围绕着生活在运河边的人们展开，他们日复一日地与这条古老的水道相伴。阮夕清以近乎人类学家的细致，描述了这些人物的生活细节，在这片看似静态的日常图景中，阮夕清悄然植入了令人不安的元素，那位被称为“铁人”的人物，他的身体似乎与现代材料发生了某种神秘的融合，他的目光穿透日常，投向某种未知的远方。这种处理方式，让古老的运河突然变得陌生，让日常的时间突然裂开缝隙，透出未来的微光。

《华夏第一公园》或许是这部作品集

中最集中体现阮夕清时间哲学的小说。故事发生在一个被称为“华夏第一公园”的公共空间，这里汇聚了各种各样的人物：遛鸟的老人、跳广场舞的大妈、谈恋爱的年轻人、玩耍的孩子。公园如同一座微缩的城市剧场，每天都在上演着看似重复却又永不雷同的生活场景。但在这个公园的地下深处，隐藏着一个神秘的设施——某种通往未来的入口，或者说是未来向现在的投射点。阮夕清将这两个空间并置：地上的公园是纯粹当下的、日常的、地方性的；地下的设施则是超越时间的、非地方的、指向未来的。

在阮夕清的小说中，这种对时间的处理不仅仅是叙事技巧的实验，更是一种对当代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。在全球化与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，我们的生活经验已经不再是单纯地生活在“当下”——我们同时被过去（记忆、传统、地方文化）和未来（科技想象、发展预期、全球趋势）所塑造。阮夕清通过让不同时间维度在同一个文本空间中叠印，捕捉到了这种当代经验的本质：我们既是地方性的存在，又超越地方性；既生活在传统中，又面向未来；既固执于日常，又渴望超越日常。

阮夕清在将科幻元素融入地方叙事时，始终保持了某种克制与平衡。他从未

让未来的想象完全吞没当下的日常，从未让科幻的奇闻压倒生活的细节。这种克制，使阮夕清的小说既不同于纯粹的现实主义写作，也不同于纯粹的科幻文学，而是游走在两种文类的边界上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混血美学。

从文本风格来看，阮夕清的语言与他的时间哲学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呼应。《燕子呢喃，白鹤鸣叫》的价值，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，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当代生活的视角。在阮夕清的小说中，地方性与全球性、传统与未来、日常与超越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，而是相互渗透、相互塑造的力量。阮夕清通过他的小说提醒我们：地方不会消失，它只是以新的方式与全球和未来交织；日常不会消失，它只是被赋予新的时间维度；过去与未来不会互相取代，它们只会在当下这个奇异的节点上，以叠印的方式共同存在。

燕子呢喃，白鹤鸣叫——这些最古老、最日常的声音，在阮夕清的笔下，同时成为通向未来的密语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的小说集不仅是对苏州的地方书写，更是对整个人类处境的隐喻：我们都生活在时间叠印的节点上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同时聆听古老的声音与未来的回响。

读到

日常深处见诗心

李海卉

钱钟书尝言“史蕴诗心”，道出历史撰述的最高境界并非材料的堆砌，而是如诗歌一般，蕴含生命的韵律与情感的温热。史家之笔如何“诗心长葆”，却是一个考验。近日捧读朱亦灵的《覆巢之下：一位江南士绅的日常生活与明清鼎革》(以下简称《覆巢之下》)与章清教授的《学术与社会：近代中国“社会重心”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》(以下简称《学术与社会》)，两书虽一治明清易代史，一究近代学术转型，却殊途同归地引入了“读书人日常生活史”的视角。在严谨的学术理性之外，它们共同探寻着那个幽深的问题：在历史沉浮中，读书人何以自处？那浸润在骨子里的“诗心”，又何以长葆？

《覆巢之下》宛如一部精细入微的微观史长卷。朱亦灵依托嘉定士绅侯岐曾在鼎革之际留下的日记，还原了一个并非传统谱系中的“标准”遗民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在求生与赴死之间挣扎的普通人。侯岐曾的日常，不再是宏大叙事，而是“奉母保孤”的琐碎操持，是与疾病的缠斗，是诗书游戏的自我慰藉。书中第二章的标题直取“诗心长葆”四字。在这里，“诗心”并非指侯岐曾创作了多少传世诗篇，而是指他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守护生命尊严的方式。当社会身份从望族士绅沦为“罪眷”时，他寄情于书帙、诗词乃至游戏，这些看似“无用”的消遣活动，恰恰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最后堡垒。这便是“诗心”的一层含义：在生存粗砺的磨砺中，用文化习性与审美情趣，将破碎的生活重新缝补成一件可以遮风挡雨的衣裳。

章清教授的《学术与社会》揭示了在风云变幻中“诗心”如何被定义与安放。书中聚焦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，读书人失去制度化的晋身之阶，被迫在陌生的现代社会里寻找新的角色与身份。当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入世之路受阻，读书人开始将“社会”本身视为新的“重心”。他们投身报刊、组建社团、进驻大学，致力于构建“学术社会”。这种转向，看似从“诗”的感性转向“学”的理性，实则是一种更深层的“诗心”投射。“诗心”在此处表现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建构热情。学人们以学术为志业，以社会为田野，守护着知识的灯火。

两本书都引入了“日常生活史”的视角，这本身就是一种“诗心”的回归。《覆巢之下》让历史人物从冰冷的道德符号变回温热的血肉之躯。《学术与社会》则通过对报章阅读史、学人社交网络的分析，让那些思想史上的巨人重新回到具体的生活场景中。这种研究路径，避免了钱钟书所批评的“只知诗具史笔，不解史蕴诗心”的偏颇。历史不仅是事件的编年，更是无数个体生命体验的河流。“诗心”，并非风花雪月的抒情，而是一种将外在困境内化为精神资源的能力。侯岐曾在诗书中抵御绝望，近代学人在学术建构中安身立命，其本质都是将历史风云转化为文化的养分。

“诗心长葆”的秘密，就藏在这日常生活的缝隙里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细节——本日记、一次社交、一场疾病的抗争，一份报章的阅读——恰恰构成了文明坚韧的肌理。真正的“诗心”，不在庙堂之高，而在生活深处，可触可感，可穿越古今，在字里行间跳动，温热如初。

荐书

还原语境的表述



《张瑞玘传》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被称为“民国奇人”的张瑞玘被历史尘埃淹没已久，该书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，遵循“实录”史传的传统，以诗证史，还原历史语境，勾勒出这位诗坛巨擘、瑰奇壮阔的人生，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，以及传统知识学者的精神世界。书中还展现了传主作为诗人、书画家、藏书家的风姿。



《口中余烬》
作家出版社

墨西哥作家布伦达·纳瓦罗以讲述者“我”的弟弟亡亡开始叙事，第一人称的笔触贯穿全书。远赴西班牙工作的母亲，与祖母留守墨西哥的“我”和弟弟，亲情的缺失、谋生的艰难，奠定了关于底层生存、移民处境、成长之痛等话题的表述，在相当程度上有着超越文学和地域的力量。



《论歌剧》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这不是一本音乐学者的专业著作，而是一位哲学教授跨界之作。伯纳德·威廉斯以伦理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和解读歌剧，给歌剧批评带来了罕有的深邃性和穿透力。书中有对歌剧本质、制作和鉴赏的理论性探讨，也有对莫扎特、威尔第、瓦格纳、德彪西、普契尼、莫扎特等音乐巨匠及其作品的评析。